

淮海詞人群的戰亂書寫及詞史意義

郭文儀

提 要

淮海詞人群是一支咸同年間活躍於揚州地區的文學群體，這批作者大多遭際不偶，親身經歷了太平天國戰爭，其作品也反映了這一時期揚州一帶士人經歷的戰亂和傷痛。以往關於淮海詞人的研究多關注其中的重要作家，以及這一群體詞史之作的成就。本文從微觀視角入手，研究太平天國時期這一詞人群體的戰亂書寫，呈現個體在戰亂中經歷的喪亂、困厄、創傷經驗，以及戰亂後漫長的重建日常以求超越的努力；從這些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戰亂對個人的持久影響，和作者嘗試療愈的努力，但部分文人最終無法自愈，走向沉淪。論文嘗試通過這些作品，揭示詞體對於表述個人經歷和情感經驗的獨特功用，展現宏大時局下普通個體的生命體驗和這一群體的集體記憶的建構，以及此類直面戰亂之作的詞史意義。

關鍵詞：太平天國 淮海詞人 戰亂書寫 創傷經驗 集體記憶

咸豐元年(1851)，金田起義爆發，開啓了太平天國時代。戰亂綿延 14 年，波及 18 省，僅作為主要戰區的江蘇、浙江、安徽七省，人口損失即高達 7 330 萬，¹對晚清社會尤其是江南地區的社會經濟秩序造成了極為深重的影響。身

1 參見曹樹基：《中國人口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年)，卷 5。

處這一時段、這一地域的詞人均無法置身事外：

他們受制於時代，受制於時代中那些有意圖的他者，很多時候，他們也無法“一走了之”，只能被迫離開安穩的既定的生活，挺身衝進巨變之中，與此同時，他們偶然間的選擇也能改變他們自己的生命軌蹟或一個時代的進程。²

淮海詞人群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被迫捲入亂局，又因此為晚清的詞史書寫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淮海詞人群是一支活躍於咸豐、同治年間揚州地區³的文學群體，主要包括揚州本籍、外來流寓以及仕宦於揚州的詞人，其代表作家如蔣春霖、杜文瀾、丁至和等，均為這一時期的重要詞人。據陳水雲統計，淮海詞人群成員有百餘人，主要成員有 40 餘人。⁴ 關於這一詞人群體的形成、經歷與寫作主題之特色，宗湘文《水雲樓詞續集序》即有所體現：“同治壬戌(1862)以後，予居泰州數年，兵戈方盛，人士流離，渡江而來，率多才傑。一時往還如王雨嵐、楊柳門、姚西農、黃琴川、錢揆初、黃子湘，皆以詩名，而蔣鹿潭之詞尤著。”⁵ 淮海詞人群生活在咸同時期的揚州一帶，其活動與身分多以鹽業為紐帶，大多官場遭際不偶，並親身經歷了太平天國等戰爭，作品也往往反映了這一時期揚州一帶士人經歷的戰亂和流離。⁶ 以這一群體獨特的身分、反映的時代主題、作品的風貌與成就，研究者將這一詞人群體視為近代詞史的重要節點：“咸豐之際，淮揚、東台一隅集合之詞群活動為近代詞史重要關目。”⁷

2 茆萌：《咸同詞壇淮海詞人群體研究》（蘇州：蘇州大學博士論文，2016年），頁17。

3 淮海詞人群的活動範圍為當時揚州府的兩州（泰州、高郵）六縣（江都、甘泉、儀征、興化、寶應、東台），其中泰州、東台等地現均不隸屬於揚州。本文所用“揚州地區”均指當時揚州府所轄地區。

4 參見陳水雲：《咸豐、同治時期淮海詞人群體綜論》，《武漢大學學報》2007年第6期，頁824—830。

5 馮乾：《清詞序跋彙編》（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年），頁1337。

6 本文研究的戰亂包括戰爭以及與戰爭相關的社會動蕩及災異，但淮海詞人群的相關創作難免更多指向戰爭本身，因此本文在論述中有時互用。

7 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763。

對於咸同詞壇以及作為這一時期代表性群體的淮海詞人群及其詞史之作，已有不少學者進行了精深的研究，珠玉在前，因此本文選擇從微觀視角入手，嘗試通過梳理作品中體現出的個體在戰亂中經歷的喪亂、困厄、創傷經驗以及重建日常以求超越的努力，展現宏大時局下的普通個體和群體的生命體驗和群體記憶，以及此類直面戰亂之作的詞史意義。

一、抒情文體的戰亂敘事

對身歷衰世甚至戰亂的中下層文人而言，人生所經歷的苦難包括生離死別、羈旅行役、風塵不偶、病困窮厄，乃至於喪亂流亡。淮海詞人群的多數作者亦是如此，這些痛苦經歷及其造成的種種隱約難以名狀的感受，正在詞體的傳統表達範圍中，他們的詞作也多抒發了哀苦之音。

（一）“詞亦有史”觀的大量創作實踐

淮海詞人群的戰爭敘事尤具特色，也是較早為研究者所關注的，如譚獻論蔣春霖詞：“咸豐兵事，天挺此才，為倚聲家杜老。”⁸周曾錦《卧廬詞話》論杜文瀾詞：“昔譚仲修謂蔣鹿潭‘咸豐兵事，天挺此才，為倚聲家老杜’，斯言當矣。與蔣同時唱和而工力悉敵者，有秀水杜小舫文瀾。……天挺二老於咸同之際，亦詞界之中興也。”⁹類似的論述在晚清並不鮮見。

“倚聲家杜老”與詞作對於戰爭的實錄有難以忽略的關係。與詩文相比，詞作為一種傳統抒情的文體，在敘事、實錄上天然受限，此前也較少在戰亂敘事中有突出的表現。謝章铤《賭棋山莊詞話》曾對詞史之作在戰爭中的缺席頗為遺憾：

予嘗謂詞與詩同體，粵亂以來，作詩者多而詞頗少見。是當以杜之《北征》、《諸將》、《陳陶斜》，白之《秦中吟》之法運入減偷，則詩史之外，蔚

8 譚獻：《復堂詞話》，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4013。

9 周曾錦：《卧廬詞話》，唐圭璋編：《詞話叢編》，頁4645。

爲詞史，不亦詞場之大觀歟？惜填詞只知流連景光，剖析宮調，鴻題巨製，不敢措手，一若詞之量止宜於靡靡者，是不獨自誣自隘，而於派別亦未深講矣。夫詞之源爲樂府，樂府正多紀事之篇。詞之流爲曲子，曲子亦有傳奇之作。誰謂長短句之中，不足以抑揚時局哉！¹⁰

謝章铤有此遺憾，固然是由於對當時的大量詞史之作未及寓目，但也說明了相比於詩文，詞體在這一主題的劣勢。因此，淮海詞人對戰亂敘事主題的突破，尤爲引人矚目。但比較同種主題下詩體與詞體的表現，可以看到兩者在事件實錄的共同前提下，記錄的重點仍有不同。

黃嫣梨《蔣春霖評傳》是較早研究蔣春霖的專著，她指出：

《水雲樓詞》的內容是多方面，但若仔細翫誦，可以發現幾乎每一首都在反映戰爭的時局，有些寫得較爲隱晦，有些則寫得極爲明顯。在其一百餘首的詞中，明言戰事的有二十多首……都是較爲明顯地表達當時兵荒馬亂，人民流離顛沛的戰爭情景。¹¹

在黃嫣梨列出的 23 首作品中，有 17 首爲長調，可見此類敘事對篇幅長短的要求。本世紀也有較多論著深入討論了《水雲樓詞》的戰爭書寫藝術，尤其肯定了蔣春霖以賦體正面書寫戰爭的詞史成就：

鹿潭《水雲樓詞》有一類戰爭詞專用賦體，即正面描寫，直言本事，點染結合，富於動態感、力度感，將戰爭的激烈場面、戰爭的劫難，描摹得淋漓盡致，如見其人，如聞其聲，而絕無半點叫囂、粗豪之氣。¹²

10 謝章铤：《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唐圭璋編：《詞話叢編》，頁 3529。

11 黃嫣梨：《蔣春霖評傳》（臺北：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 年），頁 104—105。

12 蔣春霖著，劉勇剛箋注：《水雲樓詩詞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前言，頁 7—8。

然而即使是這類被認為直寫戰爭的作品，也採用了大量比興、隱喻、用典、造境的手法，正文中敘事要素往往跳躍留白，需要靠詞題、詞序給出所指，並由讀者的想象力補充勾連，議論與抒情均點到即止。如其代表作《揚州慢·癸丑十一月二十七日，賊趨京口，報官軍收揚州》：

野幕巢烏，旗門噪鵲，譙樓吹斷笳聲。過滄桑一霎，又舊日蕪城。怕雙雁歸來恨晚，斜陽頹閣，不忍重登。但紅橋風雨，梅花開落空營。劫灰到處，便司空見慣都驚。問障扇遮塵，圍棋賭墅，可奈蒼生。月黑流螢何處，西風黯、鬼火星星。更傷心南望，隔江無數峰青。¹³

咸豐癸丑(1853)二月二十日太平天國定都南京，二十三日攻佔揚州，十一月二十七日，太平軍趨京口，十二月四日撤出揚州，此即“官軍報收揚州”。詞的正文主要鋪寫了戰後揚州的荒涼、戰亂帶來的損失和傷痛，而非兩方在江淮一帶對峙拉鋸的過程。“月黑流螢何處，西風黯、鬼火星星。更傷心南望，隔江無數峰青”預示著太平軍渡江往南而去，“蕪城”的浩劫還將繼續，可謂驚心動魄。

又如淮海詞人的另一代表作者杜文瀾，咸同間活躍於江淮一帶，後經曾國藩拔擢，署理兩淮鹽務，直接參與過對太平軍作戰的軍事行動，曾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寫成《平定粵寇紀略》。因此，雖然杜文瀾的詞學主張更多受到吳中、浙西詞派影響，但以其眼見身歷，也有較多直接書寫戰爭的作品。如《聲聲慢·袁江感懷贈江佩之》：

江淹老去，杜牧重來，尊前相對嗟歎。畫裏金城，滄桑一霎模糊。飲鷹啄殘戰血，泣寒沙、磷火青蕪。頻悵惘，似蘇臺舞罷，太息勾吳。恨指堤邊髡柳。問征人別後，還有春無？昔日笙歌，付與鬼唱嗚嗚。休怨鷓鴣聲苦。倚純鈞，猶係珊瑚。君不見，抱枯枝啼殺夜烏。¹⁴

13 蔣春霖著，劉勇剛箋注：《水雲樓詩詞箋注》，頁50。

14 杜文瀾：《采香詞》（咸豐曼陀羅花閣刻本），卷一，頁7b。

詞對鮑照《蕪城賦》、姜夔《揚州慢》的有意接續，“戰血”“寒沙”“磷火”“青蕪”“髡柳”“鬼唱”“鷓鴣”“枯枝”“啼鳥”等意象的選擇，在淮海詞人的戰爭書寫中都極具代表性和普遍性。

咸豐十年(1860)，李肇增編《淮海秋筵集》十二種，作者分別為李肇增、張安保、范凌雙、吳熙載、汪鋆、王葵、張丙炎、黃涇祥、郭夔、馬汝楫、黃錫禧、姚正鏞、白桐生(附)，除黃涇祥、姚正鏞外，均為淮海一地的本籍詞人，亦是淮海詞人群的一次重要結集。王之春《椒生隨筆》總結了詞集的主題：“《淮海秋筵集》，詞為甘泉李冰署所輯，共十二家，都為哀怨之音。蓋因兵燹仳離有感而作也。”¹⁵如張安保《念奴嬌·九日登嶽阜，時兵氣孔亟，撫今吊古，難已於言》：

菊花開了，又匆匆、輪到重陽時節。滿地平蕪斜陽冷，何處登臨眸豁。古樹盤鴉，西風唳雁，戰壘人爭說。蕭條遺蹟，至今猶想芳烈。十年避亂江淮，烽煙滿目，須髮愁成雪。獨立蒼茫空浩歎，誰掃鯨鯢巢穴。直抵黃龍，迎歸東駕，痛飲心猶熱，千秋遙想。一尊空對明月。¹⁶

作者時流寓泰州，於重陽登臨嶽阜，看到的也是滿目蕭條的戰爭遺蹟，記錄的是親歷離亂、渴望和平的痛苦心緒。《淮海秋筵集》中的作品，因編選者同氣相求的編纂目的，大多表現出相似的主題，與其說是現實社會的實錄，毋寧說是文人心靈史的記錄，嚴迪昌《清詞史》即認為該詞集為“考察太平天國革命時期維揚一帶文人心緒的有用之籍”。¹⁷

(二) 戰爭中個體事件的記錄

除直面戰爭外，淮海詞人的戰亂敘事還包括戰爭中的個體事件，如蔣春霖《虞美人》(金陵失，秦淮女子高蕊陷賊中數月，今春見於東淘，愁蛾蓬鬢，不似舊時矣)、《臺城路·金麗生自金陵圍城出》、《慶春宮·高茶庵婦死於兵，作空

15 王之春：《椒生隨筆》(揚州：廣陵書社，1983年)，頁25。

16 李肇增：《淮海秋筵集》(咸豐十年遲雲山館刻本)，頁1b—2a。

17 嚴迪昌：《清詞史》，頁529。

江吊月圖》、《甘州》(洪彥先與秦淮女子有桃葉渡江之約,未果而金陵陷,不可尋問矣,彥先哀之,爲賦此解)等。以《慶春宮》爲例:

慘月啼鶉,荒灘驚雁,四山恨匝低雲。心指潛淵,銀瓶問絕,夜寒流水無春。戍笳吹斷,歎釵鈿、倉皇路塵。驚颿亂起,滿地青楓,彌望秋燐。誰知彳亍江滸。濁酒疏篷,細雨燈昏。幽壑難呼,空彈怨瑟,佩環何處歸魂?素波重照,剩雙鬢、孤懷自溫。楚招歌罷,千里蘼蕪,都長愁根。¹⁸

高望曾,字穉顏,號茶庵,浙江仁和人,諸生,官將樂知縣,其妻陳嘉夙有才名。徐乃昌《小檀欒室彙刻閩秀詞》記錄了陳嘉逃亡中凍餓而死的過程:“陳嘉,字子淑,仁和人。同邑高望曾室。咸豐辛酉冬,杭城再圍,食且盡。嘉購粟進姑,而自食糠粃。城陷,奉姑出城,既渡江,會天雪餒甚,乃屬姑於妯娌而死。”¹⁹上闕想象陳嘉死時的情境,營造出絕望淒惻的場景;下闕寫生者的苦痛。詞作側重於環境、情感的記錄,而非事件本身的始末。

太平天國時期,杭州城兩次淪陷,大量未及逃出的市民死於兵亂中,而逃難的過程中也充滿了凍餓、劫掠和死傷。程秉釗《記事珠》記錄的咸豐十年(1860)的逃難場景可以作爲陳嘉之死的旁證:

方城未閉時,城中民倉皇奔走,出鳳山、候潮兩門者,趾相接也。婦女坐肩輿出城,人索番銀五六元或三四元不等,必飽輿夫之慾而後肯行。輿甫出城,即委其人於路而去。時江之涘百舟爭渡,雨逾大,風逾狂,舟小人多,覆於水者不可勝計。男婦老幼,悲啼宛轉於洪濤巨浪中,旁觀者傷心慘目,然俱自顧不遑,莫能救也。其幸而未溺者,率先揚帆去。岸上之人,千百倍於舟,舟既不能遍渡,嚴城已錮,且不得歸,雨打風搖,衣裙盡濕,僵立江岸,色如死灰,哀呼之聲,若猿啼狢嘯,駭人心魂。嗚呼!國家

18 蔣春霖著,劉勇剛箋注:《水雲樓詩詞箋注》,頁208。

19 徐乃昌:《小檀欒室彙刻閩秀詞》(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3集,頁14。

承平二百年，武林城中，無此異變也。是役也，事起倉卒，故驚惶之狀倍越尋常，計死於踐踏者半，死於江濤者十之二，死於困頓者十之一，而安穩渡江者則僅十之四耳。²⁰

咸豐十年、十一年的杭州二陷的慘劇，不過是這一時期長江流域重要城市的一個剪影，南京、揚州、鎮江、杭州、安慶、蘇州等城市的攻防拉鋸，帶來數不盡的小人物的生離死別，喪亂流離。這一時期，有大量的詩文、日記產生於圍城、逃亡和避難中，但由於殘酷而漫長的戰亂，今日所見不過十之一二。這些吉光片羽透露出這一時期的民衆命運和生命挽歌，而篇幅短小、長於抒情的詞作，也在此時發揮了紀實、紀事的功效，這些詞作側重於環境、經驗的記錄，而非事件本身的始末，與這一時期的日記、詩歌形成了文本語境的互補，同時，作者自覺或不自覺地將情感經驗的表達與事件記錄進行結合，具備了獨特的藝術效果。

二、戰亂經驗的直觀呈現

戰亂作為一種極端性的暴力事件，其對親歷者帶來的被剝奪感、失控感是毋庸置疑的，“一種經驗如果在一個很短暫的時期內，使心靈受一種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謀求適應，從而使心靈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擾亂，我們便稱這種經驗為創傷的。”²¹ 戰亂作為一種典型的集體性創傷事件，它對親歷其中的個體、集體甚至一代人，都將造成難以磨滅的記憶與傷痛。儘管近百年心理創傷纔成爲一種被承認並命名的心理現象，²² 但戰爭等極端事件帶來的創傷記憶橫貫於整個人類歷史，人類始終並終將直面這種苦難。

20 程秉釗：《記事珠》，載王振忠：《杭州徽商子弟眼中的太平天國史事——新發現的徽州日記稿本〈記事珠〉題解》，《九州學林》第11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春季號），頁204—205。

21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高覺敷譯：《精神分析引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頁233。

22 美國精神分析學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於1918年正式承認這種心理現象並命名為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於1980年在第三版《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中將創傷後應激障礙納入精神疾病的診斷標準，標誌著PTSD正式成爲美國官方承認的疾病。

就其表徵而言，戰亂造成的創傷超出人類的正常經驗，使之無法將這種事件與任何其他經驗對比，很難在語言層面被直接表述。它給人帶來毀滅性的打擊，受創主體因此產生心理的斷層和碎片，難以整合。由於刺激過於強烈，受創主體極有可能在當時將關於這一事件的經驗和記憶壓抑起來，僅僅表現為不安或抑鬱，但這種經驗會因為相似情境和感覺的出現而不斷再現，反復侵襲受創者，難以癒合。創傷需要被主體呈現、釋放，纔能使得受創主體通過理解該經歷重建完整的自我以獲得救贖，因此，“創傷是文學寫作的催化劑，書寫創傷也是文學發生的重要動機”。²³

古典文學中部分親歷者的災難描寫往往偏向於宏觀局勢的書寫而缺乏殘酷、真實的細節描寫，或以他者視角對災難的殘酷細節進行敘述，這在詞體中表現尤甚。這一方面固然由於古典文學傳統中克制情感的審美傾向以及對個體情感經驗的整體漠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部分親歷者規避當下痛苦的心理策略。²⁴ 隨著文學進入到近世，創作者越來越不吝於個體經驗的表達與呈現，甚至通過書寫激烈、痛苦、醜惡給讀者帶來感官刺激乃至不適的作品也不鮮見，以抒寫心曲為擅的詞體也在創傷經驗的表達上有區別於詩的突出表現，丁至和《萍綠詞續編序》即言：“意內言外謂之詞，大率鬱結難伸之隱，託為詠歌，非僅刻翠裁紅，作兒女喁喁私語也。又須情景交煉，出以自然，如憑虛御風，絕無蹟相。此中三昧，於詩有別。”²⁵ 傷痛是難以言明、不知所起的，但又徘徊於心，此種“鬱結難伸之隱”，發於詞體，顯然最為適宜。

由於創傷記憶的壓抑和延遲，以及親歷者出於自我保護的心理規避，創傷性事件帶給親歷者的記憶與情感往往並不完整，在文學書寫中的最常見的表現之一，就是作者對於創傷事件的記憶往往是跳躍的、碎片式的印象和感覺，以及對事件本身的恐懼和憎恨的情感。如前所述，跳躍留白的感官書寫正是淮海詞人戰亂書寫的一種特徵，這類詞作直觀地體現出這種戰亂帶來的心靈

23 趙靜蓉：《創傷記憶的文學表徵》，《學術研究》2017年第1期，頁146。

24 參見王曉驪：《創傷性記憶的自我隔離和審美表達——唐宋詞戰爭災難敘事的特殊模式》，《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1期，頁109—115。

25 馮乾：《清詞序跋彙編》，頁1334。

體驗是如何呈現為碎片化的文本經驗的。

(一) 感官化的“蕪城”記憶

在淮海詞人的作品中，這種心理經驗的感官呈現，首先表現為廢墟、荒野式的“蕪城”或“揚州”記憶。姜夔的《揚州慢》及其鈎連的《蕪城賦》典故的意義群，在漫長的“戰爭(或與戰爭有一定關聯)的大背景中，歷史記憶不斷豐富，聯想層面不斷增強”，並在太平天國時期，因為揚州城市在戰亂中的嚴重破壞，成為咸同之際文人尤其是淮海詞人反復書寫的主題。²⁶ 褚榮槐《水雲樓詞序》：“時或蕪城作賦，山陽聞笛；吟杜陵出塞之章，灑新亭高會之涕。目倦修途，心傷逝湍。吊精靈於夜壑，惜日月於扁舟。”²⁷ 如前引蔣春霖、杜文瀾的作品，“野幕巢烏，旗門噪鷓”、譙樓笳聲、斜陽頹閣、紅橋、空營、蕪城、月黑、西風、鬼火、寒沙、枯枝等等，無不充滿了蕪城廢墟之感。又如吳熙載《揚州慢·咸豐三年十二月入揚州郡城作》：

道是還家，尋疑重夢，黃埃繞遍歸程。荒園獨樹，剩幾點餘青。自歌吹、繁華日久，干戈兒戲，民不知兵。念蒼生、誰問空教，重做蕪城。 鮑照去後，有坐飛、沙石還驚。想鬼伯吹燈，磷青閃壁，都是冤情。骨肉舊歡安在，無人哭、哭也無聲。歎飄零身世，何堪重卜他生。²⁸

吳熙載此詞寫在上引蔣春霖《揚州慢》後一月，詞意也接續《蕪城賦》之意，並直接化用“孤蓬自振、驚沙坐飛”等句。與此前的蕪城書寫不同的是，這一時期文人“廢墟”、“蕪城”的文本呈現，來自真實的感官經歷，而非文學的想象。大量來自當時士紳、傳教士的記錄表明，戰爭後期，江蘇、浙江、安徽、江西城市十室九空，鄉野黃茅白骨。一位牧師描述了從上海行經蘇州時所見的城鎮慘景：

²⁶ 參見張宏生：《戰爭書寫與記憶疊加——清代的〈揚州慢〉創作》，《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頁61—69。

²⁷ 馮乾：《清詞序跋彙編》，頁1334。

²⁸ 李肇增：《淮海秋笳集》，頁4b—5a。

城鎮與村莊都是一片悲傷至極的景象。這些曾經繁榮的市集現已徹底荒涼,成千上萬的房屋被燒成灰燼。到處可見孤獨的老頭或老嫗獨步履蹣跚、顛顛巍巍地走在斷垣殘壁之中,因周遭的殘敗不堪而沉思、啜泣。除了這些景象,不斷映入眼簾的死屍也讓人感到無以名狀地噁心。²⁹

“荒園獨樹”、“鬼伯吹燈,磷青閃壁”、“無人哭,哭也無聲”,皆是真實的所見與感受。作為出身揚州本籍的詞人,吳熙載親眼目睹親人友鄰的喪亡,使詞的情緒表達更為強烈,“骨肉舊歡安在,無人哭,哭也無聲”,無聲之哭,尤為慘痛。

廢墟的重訪,使親歷者聯結了過去的繁華與當下的荒涼,直觀感受到戰爭的破壞力及其帶來的城市、建築物、個體無法反抗的死亡,感受到個體處於戰爭及此時空之中的被動無助,親歷者因此充滿對生命的懷疑和質問,“歎飄零身世,何堪重卜他生”。在淮海詞人筆下,長遠的歷史記憶和真實的心靈經驗結合,廢墟、荒野式的“蕪城”和重訪舊地後的今昔對比,不再是文人想象中的戰亂,而是給予詞人重大創傷的真實,“可奈蒼生”(蔣春霖詞),“無人哭,哭也無聲”,是慘重現實之下的控訴。

(二) 死亡相關意象的大量使用

戰亂迫使人直面真實的死亡,這也使得戰亂區別於其他創傷事件。李鴻章對戰後江蘇一地的情況描述:“查蘇省民稠地密,大都半里一村,三里一鎮,炊煙相望,雞犬相聞。今則一望平蕪,荆榛塞路,有數里無居民者,有二三十里無居民者,間有破壁頹垣,孤嫠弱息,百存一二,皆面無人色,呻吟垂斃……”³⁰由於長年戰爭的巨大破壞和戰爭後期的堅壁清野政策,部分地區甚至出現了

29 楊格非(Griffith John)牧師信件,英文載 Lindsay Brine: *The Taiping Rebellion in China: a narrative of its rise and progress, based upon original documents and Information Obtained in China.* (London: J. Murray, 1862), pp.250 - 251. 翻譯據梅爾清著,蕭琪、蔡松穎譯:《躁動的亡靈:太平天國戰爭的暴力、失序與死亡》(新北:衛城出版,2020年),頁194。

30 李鴻章:《籌賑收復地方並酌情調免漕銀片》,《李鴻章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奏議1,頁286。

人食人的慘劇：

自池州以下，兩岸難民，皆避居江心洲渚之上……壯者被擄，老幼相攜，草根掘盡，則食其所親之肉，風雨悲啼，死亡枕籍……徽、池、甯國等屬，黃茅白骨，或竟日不逢一人。³¹

充滿感官衝擊的餓殍、屍體、白骨成爲日常的常見圖景，與之相應，淮海詞人的詞作中充滿了與死亡相關的意象，如“野火”、“磷火”、“鬼哭”、“戰血”等，這些意象並非隱喻，多爲作者親見。在傳統的詩詞作品中，此類意象很少在某個群體中大量出現，可見多年戰亂對生命、城市的巨大破壞。親歷者記憶中反復出現的這類碎片式的意象及其帶來的恐懼，如幽靈般反復閃現徘徊於作者的記憶中，最終又通過作品傳遞給同時的作者與讀者。蔣春霖寫好友金麗生自金陵出逃的名作《臺城路》，小序即自言“時畫角咽秋，燈焰慘綠，如鬼聲在紙上也”：

驚飛燕子魂無定，荒洲墜如殘葉。樹影疑人，鴉聲幻鬼，欹側春冰途滑。頽雲萬疊，又雨擊寒沙，亂鳴金鐵。似引宵程，隔溪磷火乍明滅。江間奔浪怒湧，斷笳時隱隱，相和嗚咽。野渡舟危，空村草濕，一飯蘆中淒絕。孤城霧結，剩羅網離鴻，怨啼昏月。險夢愁題，杜鵑枝上血。³²

王韜、杜文瀾對金麗生從金陵脫逃始末皆有記載。王韜手抄本《金陵癸甲紀事略序》：“《金陵癸甲紀事略》……姑蘇謝介鶴作也。介鶴於癸丑春爲賊擄至金陵，置糧館中。曾與金陵張炳元、携李金麗生及同志數百人，謀爲內應。卒不成，炳元死之。介鶴乃以計逸出。”³³這一事件發生在咸豐四年正月，金麗生與

31 曾國藩：《密陳巡閱諸軍情況及可喜可懼形勢片》，曾國藩著，殷紹基等整理：《曾國藩全集》（長沙：嶽麓書社，1990年），奏稿6，頁3171。

32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唐璋圭編：《詞話叢編》，頁1162。

33 蔣春霖著，劉勇剛箋注：《水雲樓詩詞箋注》，頁108—109。

謝介鶴等人逃出金陵，夜間於沙洲避雨，逃生時凍餒交加、驚魂不定、草木皆兵的心理狀態，可謂栩栩如生。而鬼聲、磷火，斷筋、孤城，更增添了驚心動魄的恐怖氛圍。陳廷焯《白雨齋詞話》評此詞曰：“繪聲繪影，字字陰森，逼人毛髮，真乃筆端有鬼。”敘述者、作者、讀者都能夠感受到作品中傳遞出的倉皇、恐懼、淒厲以及其後反復使人驚醒的噩夢般的回憶。惠瑜《筠軒漫錄》：“其《淒涼犯·夜泊萬福橋》云云，及《臺城路·金麗生自金陵圍城出》云云，二詞寫烽煙流離之狀，恍同親歷。”³⁴ 蔣春霖雖未親歷金麗生死裏逃生的驚險過程，但他在戰亂中親歷了喪亂流亡，在一個“畫角咽秋，燈焰慘綠”的夜晚寫來，融合了過去與當下，自己與他者的記憶。

由於這一時期的詞人親眼目睹了極具衝擊性的極端圖景，作品中也不乏極為露骨的死亡意象，如楊夔《蘇幕遮·過戰場》：“怨雲深，慘霧塞。漠漠連天，天末陰燐熠。饑鶻飢鷹飛六七。噙鬪啣髒，一一濠邊立。撥黃沙，尋折戟。斷刃殘鋒，血漬凝寒碧。驀地腥風旋戰壁。隱隱風中，鬼語聲啾唧。”³⁵ 觸目可見的白骨燐火，由於不及掩埋，飢餓的鷹鷂在啄食腐肉，到處是折斷的兵器和血蹟，風中傳來血腥的氣息和鬼聲。可悲之處在於，這一極端的場景並非想象和誇張，而是出於現實。由於現實的殘酷，文人纔衝破了文體的審美性限制，將之形諸筆端。白骨彌望的荒野、廢墟中的鬼火，風中傳來的戍鼓和斷筋，是這一時期文人共同的戰爭記憶，也是這個時代促成的詞人的意象選擇。

（三）戰爭親歷者的軍事物象題詠

一部分淮海詞人親身參與了清廷對太平天國的軍事行動，詞中的戰爭物象也極具特色，對筋、鼓、戰旗等意象反復出現在相關作品中，李肇增等人的作品更直接以《淮海秋筋集》命名。同治元年，金安清、杜文瀾、蔣春霖等於泰州結“軍中九秋詞社”：

同治癸亥春，鎮江揚州水陸各軍，以餉缺將潰，金眉生廉訪承薛觀唐中

³⁴ 蔣春霖著，劉勇剛箋注：《水雲樓詩詞箋注》，頁108—111。

³⁵ 楊夔：《秦鏡漢硯齋詩餘》，稿本，頁2。

丞會檄，馳駐泰州，設籌餉局，以安軍心。三五月間，竟得爬梳就緒。乃以公暇廣招才士，大開詞壇。……文墨之盛，遠近所傳，無殊王漁洋、盧雅雨之在揚州也。比有軍中九秋詞社，為“秋角”、“秋堞”等題，同作九人。³⁶

九秋本指秋日有九十日，明清文人多有“九秋”之作，大多以九種秋日物事為主題，但“軍中九秋詞”以軍中的九種事物為題，“因為特殊的唱和背景，所詠物件已超出了傳統‘九秋詞’的範圍，是對該題材的一種更新”。³⁷

軍中九秋社的參與者共九人，除上述三人外，還有宗源瀚、錢勛、黃文涵、張熙、黃涇洋、姚輝第等，所詠九秋為秋袴、秋櫛、秋埃、秋竈、秋鎚、秋幢、秋幕、秋堞、秋角，無不與軍事有關。由於詞社發生在清廷對太平天國戰爭的最後時段，湘軍基本完成了對天京的合圍，處於相對有利的位置，詞社的作者均為鹽漕之官，主要在後方籌措糧餉，因此部分作品情感也比前期要樂觀、蒼勁。如蔣春霖《轆轤金井·秋竈》：

半郊紅樹，放樵蘇、駐馬水餐星飯。萬隊炊香，認晴空煙散。江寒路遠。趁野井、露泉尋遍。帳角支鐙，矛頭浙米，涼飆催晚。移車翠旗乍展。訝才增頓減，奇計千變。朝食姑停，看封狼先剪。霜華又滿。費籌筆、夜深傳膳。策笑量沙，功歸曲突，雲臺秋宴。³⁸

軍中九秋詞也是蔣春霖作品中基調較為高昂之作。

(四) 對哀苦感傷意象的共同偏好

總體而言，淮海詞人普遍表現出對冷感、黯淡等哀苦感傷意象的偏好。學者曾對蔣春霖的 169 首詞作過量化的統計，指出蔣春霖不僅在視覺、聽覺形象

³⁶ 杜文瀾：《憩園詞話》，唐圭璋編：《詞話叢編》，頁 2904—2905。

³⁷ 任軻：《咸同變局與詞壇新動向》，《文學遺產》2024 年第 2 期，頁 147。

³⁸ 蔣春霖著，劉勇剛箋注：《水雲樓詩詞箋注》，頁 222。

中偏好使用冷色調、與戰亂相關、易引起人淒寒感覺和迷蒙惆悵感的意象，也偏愛使用給人淒哀、怨恨、寒冷等主觀情感的動詞和形容詞，從而呈現出感傷的特質。³⁹ 除蔣春霖詞外，有研究者對《淮海秋筵集》的 126 首詞也作過量化的統計：

表情詞語如愁、淒、孤、恨、怨、悵等出現次數最多，全集中幾乎首首言愁……集中所論景物以雨、秋、霜、西風、淚為多……動詞中，“離”和“斷”出現頻率較高。……可一窺其哀苦程度。⁴⁰

其中的高頻意象也基本重合。以上意象不僅在同一作者的作品中反復出現，也閃現在這一群體的多數詞人作品中，可見是集體性的創傷記憶。李肇增《淮海秋筵集序》詳述了詞集編選的深衷：

往從意園諸君為文酒之會，少長列坐，前喁後於。命白驄辭，陵瞰前哲。秦青絕煩手之響，韓娥詠繞梁之音。鏤燭騰箋，迢然遐抱。北場絳詠，何其樂也。屬大風橫起，豺狼食人；故舊愴荒，半登鬼籙。風雨之夕，歌《大招》而魂遠；尺波既謝，覽遺文而神傷。邈矣牙琴，心焉摧折。……然而秦川公子，茹歎流離；杜陵野翁，含傷羈泊。攜黃金而已盡，紛赤禪兮橫來。淪蹟風煙，汰歡林澗。雖復陶弦觴於嘉月，流盼睽於蛾眉。而長笛短笛，盡河濱同病之歌；傾國傾城，結漢女求思之詠。亦惟是情涯佇苦，憂緒增酸已也。遂乃研宮擿徵，懷柳囊辛。東謳共西缶並哀，白雲與紅桑競戚。都為一卷，係以弁言。雍門之操，非媚賞於聾俗；車子之奏，期躡伎於溫胡。苦調義心，是所望於臚俞之聽也。⁴¹

39 朱惠國：《論鹿潭詞的感傷特質》，《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3期，頁65—69。

40 茆萌：《試論淮海詞人群體的創作風格》，《徐州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3期，頁56。

41 李肇增：《淮海秋筵集》，頁1。

戰爭對往日繁華美好的摧毀，給作者帶來的身心之痛，促使作者將這種痛苦付諸筆墨，求得友人的同理與慰藉。《淮海秋笈集》的成員關係較為密切，他們不僅是同鄉，其中還有父子（張安保、張丙炎）、姻親（黃錫禧、郭夔）、師生（吳熙載、王葵），摯友等，往來密切，經歷與感受也極為相似，創作也因此主題、風格等方面呈現出高度的一致性。

個體的創傷經驗不能複製，但記憶可以分享與交流，“一旦語言化之後……個人的記憶就融合在人際間交流的符號系統中了……它們可以被交換、被分享、被證實、被確認、被糾正、被爭論——最後被記錄下來。”⁴²因此，在淮海詞人對流亡、離鄉的反復回憶中，在他們反復地交流、分享、互動、修正及記錄中，他們逐漸提煉並積澱出淮海詞人對於戰亂的集體記憶，並在文本中呈現出相對一致的意象碎片與感情基調。這種情感的聯結和共振又最終促成了如淮海詞人群這種“情感共同體”的形成，也印證了學者對咸同詞壇的總結：“咸同年間曠日持久的戰爭帶來的創痛似乎化作一種‘時代病’，籠罩著詞人的生命史。”⁴³

三、回歸日常的文學嘗試

戰亂的破壞性不僅體現在對生命和經濟的摧毀，也體現在日常的方方面面，以往既定的生活模式被打破，不斷地提醒人們在戰亂中所失去的平衡與秩序。因此，親歷者只有通過不斷試圖回到或重建過往的日常模式，纔能夠獲得曾經失去的安全感和控制感。在行為中可以表現為重訪舊地、重見故人、模仿失去的父母親友的行為、重複過去的儀式等等，表現在文學中亦是如此，如在戰亂中仍然持續進行的修禊社集、戰亂後對悠閒繁華日常的重建等，均體現出文人想要重回往日、掌控秩序的努力。然而已經歷的終將打下烙印，已失去的不能挽回，戰亂及其次生災害的破壞性正在於此，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作者的重

42 Robert Goodin (ed.), Charles Tilly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ntextual Political Analys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18.

43 任軻：《咸同變局與詞壇新動向》，《文學遺產》2024年第2期，頁140—152。

訪、重建之作中仍然回蕩著戰亂的雜音。

(一) 戰亂中的修禊社集與往日重訪

在經歷洪楊之亂的十數年中，淮海詞人雖然迭經流離，但社事之集仍然往往可見。如杜文瀾《采香集》卷二《陌上花》記錄了咸豐十一年（1861）與丁至和等人的修禊活動，詞人雖因事未往，但仍然按慣例作詞：

棠梨謝了，啼鴉無賴，又催春暮。一院茶香，迤邐倦鷗吹聚。破禪也帶看
花眼，偏被柳絲牽住。問青溪甚事，年年芳徑，俊遊都誤。 傍闌幹向
晚，飛來燕子，似笑韶華虛度。百感迴腸，曲水算知愁緒。夢魂尚倚山陰
棹，換了冷煙疏雨。恐他時再證，浮杯佳約，鬢添霜縷。⁴⁴

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丁至和、蔣春霖、郭夔等人有荷花生日的唱和；這一年杜文瀾、丁至和等人還有數次銷夏之集，社事之詠散見於各家詞集中。在一部分詞作中，作者表現出平和、悠閒的文士生活狀態，儘管作品產生於流離他鄉之際，如丁至和《紅情》：

六月二十四日金螺青招同蔣鹿潭、鮑問梅、李冰署、郭堯卿集思古齋宴
荷花生日，拈玉田譜，即席分詠。
歌殘玉笛。喚野鷗夢醒，訂盟香國。占卻芳辰，水佩綃裳弄憨碧。臨鏡
倏然顧影，疑太液、初承恩澤。想隔岸、皓腕湔裙，塵濺襪羅濕。 瑤
席。算雲積。怕露冷綠房，蓋傾珠滴。素蟾半蝕。卅六鴛鴦怨岑寂。今
夜紅衣漫舞，愁醉裏。扶嬌無力。願歲歲、花永好，試妝似昔。⁴⁵

這顯然是一次成功的宴集，因而詞人有“願歲歲、花永好”的祈願，然而結句的“試妝似昔”四個字又暗示著這種祝願中聯結未來的並非當下，而是已經失去

44 杜文瀾：《采香詞》，卷二，頁13。

45 丁至和：《萍綠詞》（咸豐十一年曼陀羅花閣刻本），卷三，頁11。

的往昔,文學對現實的代償作用亦在此呈現。

顯然這種對往昔日常的回歸是有風險的,尤其當形成強烈的今昔對比之時。如這一年的銷夏之集,丁至和《小重山令》詞序:“辛酉夏同人遯暑於東淘之龍溪,筆硯琴尊,謝絕塵盪。因憶揚州湖上昔遊,亭台歌管之盛,恍如夢覺。”⁴⁶丁至和“十年漂泊不成歸”的愁思,也激發了杜文瀾的愁緒,因有《小重山令·與保庵話揚州湖上舊遊》,下闕:“愁弄玉參差。銷魂春去也,鬢絲絲。惜花心事已全非。西風怨,惟有白鷗知。”⁴⁷往昔時光的不時閃現,反襯了現實的黯淡。

偶爾失敗也許只是一種必經的過程,部分作者最終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戰爭帶來的長久的傷痛。一紀之後的同治十二年(1873)荷花生日,丁至和再遊揚州,臨湖重結茶社:“煙花久不下揚州,春雨杜鵑愁。記得憑欄一竿,垂水三五舊閑鷗。荷花生日重來此,揮塵說風流。可似當時,衣香人影,簫管到深秋。”⁴⁸雖有重訪舊地、舊遊不再的惆悵,但從咸豐十一年的“十年漂泊不成歸。湖山怨,殘柳暮鴉飛”到同治十二年的“荷花生日重來此,揮塵說風流”,區別可見。而丁至和等人反復採用的通過時間詞聯結歷史記憶的方法,也在戰亂之後被淮海詞人採用,並被部分作者發展出重構記憶的功用。

(二) 戰亂後的日常重建與記憶重構

杜文瀾《采香詞》完整體現了戰亂中和戰亂之後的文人心靈史,也是淮海詞人中重建日常的成功範本,在這一範本中也可以看到作者是如何通過作品的時間聯結和細節覆蓋去逐漸修飾、重構戰亂記憶的。

同治三年(1864)金陵克復,其時杜文瀾在曾國藩幕下,是這一事件的親歷者。《采香詞》卷三有《大酺·甲子六月,克復金陵,志喜,呈湘鄉爵相》:

盼捷書飛,鏡歌起,江上堅城初克。蒼梧塵四擾,歎秣陵金粉,黯無消息。

46 丁至和:《萍綠詞》(咸豐十一年曼陀羅花閣刻本),卷三,頁13。

47 杜文瀾:《采香詞》,卷二,頁15。

48 丁至和:《萍綠詞再續》(光緒刻本),頁4b—5a。

玉樹悲秋，銅駝卧雨，臺榭荒埋荆棘。十年勞兵計，看夕烽盈野，戰袍生虱。賴軍令山嚴，廟暮雲湧，蕩平今日。秦淮依舊碧。冷鶯燕、何處尋春蹟。但剩取、飢鶩啄肉，病馬嘶風，夕陽同避旌旗色。浩劫紅羊盡，憑聖武、遍銷鋒鏑。拯顛沛、施膏澤。豐功偉烈，應向燕然深勒。問誰染濡大筆。

數日後，又有《江南好·金陵感舊》：

鞞鼓聲銷，亂塵吹盡，大橋猶識江東。銅駝埋草，無語怨春風。一片樓臺金粉，空付與、嗁鴉匆匆。蘼蕪畔，歸來燕子，暗泣芳蹤。前遊還記否，歌猜儷鳳，茗鬪團龍。問桃根桃葉，香夢誰通。嗚咽秦淮流水，是多少、紅淚攪濃。斜陽外，清涼寺冷，淒絕數聲鐘。⁴⁹

值得注意的是，文本書寫的策路與真實歷史事件的罅隙在此得到充分的體現，試看以下兩條當事者記錄：

城中偽宮賊館以及民居，概付一炬，百物蕩盡，而群尸山積，善後事宜，竟不知如何下手。（曾國藩《覆李宮保》）⁵⁰

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滿二三歲者，亦斫戮以為戲，匍匐道上。婦女四十歲以下者，一人俱無。老者無不負傷，或十餘刀，數十刀，哀號之聲達於四遠。（趙烈文《能靜居日記》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三日）⁵¹

本文的初衷並不在於討論不同記錄者在歷史記錄中體現出的歷史側面和記錄意圖，而是試圖通過這一文本的重讀去考察杜文瀾詞作的書寫策略：同治三年太平天國戰敗後金陵城的戰亂場景被“如實”記錄，但更為殘酷的真实場景經

49 杜文瀾：《采香詞》，卷三，頁9b，頁10a。

50 曾國藩著，殷紹基等整理：《曾國藩全集》，書信1，頁4613。

51 趙烈文，樊昕整理：《趙烈文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第3冊，頁1171。

過文學修飾有所隱晦,同時以緘默巧妙地使慘劇製造者的身分發生了位移。這或許可以視作戰亂記憶的第一次修飾。

以同治三年為節點,此後可以看到杜文瀾逐漸回歸雅秀創作風格的作品,且多記錄了悠閒的士大夫日常。光緒二年(1876)端午,是日又為金危危日,杜文瀾有《壽樓春·丙子閏重五,即事》:

欣重逢端陽。正空庭過雨,梅子纔黃。記得秦淮前度,畫船輕颺。桃葉渡,榴花觴。十二年、懸蒲猶香。自白雪裁羅,紅絲係縷,青鬢又添霜。今浮宅,仍歡場。遇佳辰再閏,吉午占良。更喜危危日,(通書中金危危日數年始一見,吳人爭祀之),共迎嘉祥。描錦帶(蘇東坡云危危日畫貓能辟鼠,因倩陳小士茂才戲圖之。《記事珠》載張搏好貓,各製佳名,有“錦帶”),縫縑囊(俗傳是日縫囊最吉)。拄瘦筇,閒遊滄浪(吳門重修滄浪亭,足供遊眺)。聽湖上龍舟,衝波鼓鉦聲未央。⁵²

作者對此日習俗的津津樂道,和對細節不厭其煩地描述,顯示出作者終於重返平和喜樂的日常。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十二年”這一時間的提示,作者通過兩個時間的聯結,對同治三年(1864)《江南好·金陵感舊》經驗進行了重構和覆蓋:節慶的儀式感和歡樂足以衝淡和覆蓋過往的不幸,殘酷的歷史真實再次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記得秦淮前度,畫船輕颺。桃葉渡,榴花觴。十二年、懸蒲猶香。”至此,慘痛的戰亂記憶被覆蓋重構,日常得以重建,作者因此超越了戰亂帶來的痛苦。

由此可見,時間的重提和聯結不僅能強化苦難的記憶,也可以通過不斷地記憶修正進行淡化和重構,這一成功的經驗在《采香詞》卷四中被不斷採用,上述丁至和的作品中也有所體現。

另如《采香詞》卷四的一次元宵唱和,題為《碧玉簫·分詠春鐙詞,禁“離”、“愁”、“別”、“苦”諸字》:“寶鼎疑雲,珠鐙替月。銀花影閃朝霞屑。歌管聲

⁵² 杜文瀾:《采香詞》,卷四,頁9b—10a。

喧，隔斷簷敲鐵。袖卷翔鴛，裙黏睡蝶。訶黎領綴丁香結。檢點金箱，又慶元宵節。”⁵³一改前三卷中節慶詞的愁雲慘霧，在節慶時對愁苦之詞有意識的回避，也體現出這一時期的作者對今朝歡愉的追求和往日哀苦改變。

《采香詞》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成功的範本，作者通過歡愉時光中對過往的反復重提和記憶修飾，文本被記錄後成為新的記憶，杜文瀾最終通過日常的重建，消弭了戰亂帶來的傷痛，重新回歸了雍容平靜的士大夫生活。

（三）難以走出的戰亂創傷

然而對於一些被戰亂創傷嚴重困擾的個體或群體，他們更需要主動面對失去的過去，梳理和克服造成傷害的事件，纔能重新獲得心理的完整和平靜。在他們的作品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對傷痛的麻木和回避，對過去日常的回歸嘗試，但最終還是被創傷困擾，歸於痛苦。

蔣春霖《水雲樓詞》的悲苦之音，貫穿始終，始終為戰爭、流寓、喪亂困擾，與杜文瀾戰後的作品形成鮮明對比。創傷性事件會給親歷者留下一種深刻的感觀印記，有時表現為某種聲音、氣味或色彩，每當類似的情境發生，事件發生當時的場景就會被召回。⁵⁴如在咸同時代敘事文本中經常出現的來自屍體的“腥臭”“臭腐”的氣息，來自戰火焚燒的“焦氣”，來自難民的慘叫和哀嚎，都成為回憶中最為鮮明的印記。⁵⁵

代表戰爭的角聲也是印刻在文人心靈中的感官記憶，淮海詞人大多有題為“聞警”之作，這一時期的“秋角”“秋笳”，都具有明確的戰爭指向，《淮海秋笳集》的命名也充分體現出時人對戰爭之聲的刻骨銘心。《水雲樓詞》始終閃現著這樣的兵戈意象，如作於太平天國平定後的《琵琶仙》：

五湖之志久矣，羈累江北，苦不得去。歲乙丑，偕婉君泛舟黃橋，望見煙

53 杜文瀾：《采香詞》，卷四，頁11。

54 參見 David Pillemer, *Momentous Events, Vivid Memori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等。

55 參見湯氏：《鯁聞日記》等，莊建平：《近代史資料文庫》（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第5卷，頁631。

水，益念鄉土。譜白石自度曲一章，以箜篌按之。婉君曾經喪亂，歌聲甚哀。

天際歸舟，悔輕與、故國梅花爲約。歸雁啼入箜篌，沙洲共漂泊。寒未減、東風又急，問誰管、沈腰愁削。一舸青琴，乘濤載雪，聊共斟酌。更休怨、傷別傷春，怕垂老、心期漸非昨。彈指十年幽恨，損蕭娘眉萼。今夜冷、篷窗倦倚，爲月明、強起梳掠。怎奈銀甲秋聲，暗回清角。⁵⁶

詞作於同治四年(1865)，此時兵戈方平，然而喪亂之痛仍然縈繞在作者及其妾黃婉君的敘述中。“今夜冷、篷窗倦倚，爲月明、強起梳掠。怎奈銀甲秋聲，暗回清角”，如同詞中二人的最終命運，即使想要強起振作，但最終仍然無法擺脫因爲“秋聲”與“清角”而不斷被召回的與戰亂相關的往日。被困於創傷記憶的個體，不斷觸碰到相似的聲音、氣味、色彩，不斷閃現往日慘痛的經驗，並在作品中一再的記錄和固化下來，這也是戰亂經歷者中的另一種宿命，蔣春霖不過是其中的代表者。這一作品創作於蔣春霖最後的生命時光，最終他們溺斃於無法擺脫的戰亂記憶和人生困苦中。

本文無意於繼續探問蔣春霖之死的真相，或是質疑對於始終沉默的另一死者黃婉君及其死因的可疑描述。但不應忽略的是爲戰亂的傷痛所困擾的詞人的生活狀態。當我們重新以戰亂的受害者的視角去審視淮海詞人的生活及創作時，也許能夠更多地感受到個體在極端時局下的痛苦和無力，即使他們的生命經驗也許瑣屑、弱小、無關於宏大的敘事。同樣，或許也能看到關於戰亂的書寫，可能帶來的救贖，抑或失敗。

四、戰亂書寫的開拓與意義

如果說鴉片戰爭是近代史的開端，那麼由此肇端的不僅僅是近代的衝擊，還有晚清的亂局，和在亂局中醞釀的無序。咸豐元年的太平天國戰爭進一步

56 蔣春霖著，劉勇剛箋注：《水雲樓詩詞箋注》，頁 202—203。

為捲入其中的詞人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且因其革命的性質和激進的政治主張，影響深遠。七十年後，羅爾綱在其《太平天國史綱》結尾處，對其產生的餘波有著如下描述：

總之，太平天國雖然過去了，雖然在七十年前便如急浪驟潮般地消逝了，但是，太平天國所留的影響卻永遠磨滅不了。它的革命的目的，它的典章制度，有的後來的革命者已經給它實現了，有的餘波所及至今還有人憧憬著，追求著，以至於渺茫的將來。⁵⁷

在這一深刻持久的動蕩下，以淮海詞人群為代表的詞人群體，集中地展現出以詞紀史的獨特風貌和功用。

（一）戰亂敘事的範式創新

嚴迪昌評蔣春霖《臺城路》：“敘事而不以事實作為填詞料，提空而寫心靈顫抖狀，這是倚聲妙擅之處，空靈也由此而出。”⁵⁸實質指出了淮海詞人詞史之作的普遍手法。試比較錢仲聯《近代詩鈔》所論金和的同主題敘事詩：“太平天國時，他寫了敘事長詩《蘭陵女兒行》、《烈女行記黃婉梨事》，歌頌了敢於跟強暴勢力鬥爭的英勇女子，客觀上暴露了清王朝反動軍隊危害人民的罪惡，詞鋒犀利，敘事曲折洞達，人物形象鮮明。”⁵⁹敘事詩對於敘事要素的文體規範，作者講述故事的敘事要求，共同構成了詩史之作的敘事結構。

與金和、黃燮清等人反映太平天國戰爭的敘事詩相比，與咸同以前如陳維崧、林則徐等人的詞史之作相比，淮海詞人的詞史之作主要體現出以下創新之處：

首先，體現出對城市景觀記錄的偏愛。太平天國時期的作者大多生活於城鎮，而戰爭的破壞使得涉及城市無不化為廢墟。作者在長期的逃難後思念

57 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綱》（長沙：嶽麓書社，2013年），頁116。

58 嚴迪昌：《清詞史》，頁479。

59 錢仲聯：《近代詩鈔》（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6。

或回歸故土,不斷地進行廢墟重訪式的創作。這一時期的詞人流徙又往往隨著重要的城市攻防戰爭而發生,如金陵之戰、揚州之戰、鎮江之戰、杭州之戰、安慶之戰等,因此,可以看到大量的文本體現出對戰爭前後城市、自然環境的白描、渲染,側重記錄作者對於戰亂的記憶與情感經驗,以及戰亂帶來的持續而難以言說的心靈創傷。同時,作品普遍體現出對鮑照《蕪城賦》、姜夔《揚州慢》的有意接續。如姚正鏞自言“於揚州僑居最久,喪亂既經,繁華漸復,撫今思昔”,有大量感懷揚州今昔之作,其《夢揚州》:

瓊花惟揚州所獨,自宋已後寂無可尋。予侍任來揚,權使署東一樹枝柯奇古,不識何名。三月作花,瓣微黃而香,葉瑩潔而柔,非若平時所見聚八仙繡毬比倫也,因檢鄭興裔《瓊花辨》,謝肇淛《五雜俎》考之,始定為瓊花。逐日日宴,賞五年於茲。自經喪亂,廡宇燬盡,樹亦罹災,瓊花根蒂蕩無,予遺追憶舊事。自紀盛觀,然而其音哀矣。

冠羣芳。是舊時曾誇,人世無雙。自歷歲年,寂寂蕃釐亭傍。蕊珠靈秀甘埋沒,有一株、留得天香。冰絲瑩,雲容淡,為他傾國添粧。 憐我詩癡酒狂。邀玉樹朝朝,稅院春光。自客廣陵,似此花時難償。卻教別夢烽煙惡,送玉真、還返仙鄉。從今後,凡葩俗豔,都惱愁腸。⁶⁰

此詞將城市典型景觀的今昔對比穿插寫來,具備很强的藝術感染力。

這首詞也體現出淮海詞人的戰亂書寫在寫作手法上的特點:大多採用比興、隱喻、用典、造境等手法,正文中敘事要素往往跳躍留白,需要靠詞題、詞序給出所指,並由讀者的想象力補充勾連,議論與抒情均點到即止。

通過這種方式,部分詞作兼顧了戰爭敘事和詞體抒情的共同要求,其中的翹楚如蔣春霖等探索出一種兼具抒情和敘事功用的詞史之作的範本。

此外,戰爭和死亡意象的大量使用,也是這一時期作品的一種新創。其中不乏在意像選取上臻於極致的作品,除上文楊夔的《蘇幕遮》外,另如陳慶溥的

60 姚正鏞:《吾意齋長短句甲乙稿》(光緒刻本),頁23。

《醉蓬萊》，詞作於戰爭剛剛結束的同治三年(1864)六月：

舟至毗陵，苦無緯路，撥草尋途，尸骸礙步，愁慘之狀，目中所未經也。
鷓飛湖路滯，濁浪停流，灑槳凝皺。誰掩殘骸，怕腐腥薰鼻，溺聲聾泡，餓
屍牙露，任蝸蛄攢透。港葦根肥，池萍膏膩，渾波深黝。再到毗陵，
草鋪花謝，兩岸頽垣，萬家欹甃。煙莽苔叢，算不堪回首，記得當時，萬樓
鶯榭，有舞衫歌袖。此際茅簷，衰翁同倚，還應思舊。⁶¹

裸露於野的屍體，以及屍體腐化的細節，被作者詳細地記錄下來，在真實地記錄之後，下闕又對這一慘狀進行了往昔繁華的文學想象，可見作者是有意識地記錄並對該經驗進行文學的再加工。

然而淮海詞人的這一類創作並未被其後的作者接過，或許也證明當失去淮海詞人所經歷的“現實”的寫作場域後，部分過於突破審美傳統的意象在進入文本時仍將受到限制。

(二) 集體記憶的建構與療愈功用

淮海詞人群經歷了戰亂流離，他們依然保持了社集的傳統，延續了文人群體的互動和共同創作。這種持續性的集體創作，不僅讓他們在動蕩時期依然保持文學創作的活力，也在詞作中形成了相對一致的風格。

在這一時期的唱和中，詞人們的創作主題、情感體驗和特定意象往往互相影響，以《淮海秋筵集》為例，詞集中同一主題的同聲相應，創作過程中提示時間、人物、事件的關鍵詞的反復出現，尤其是對於創傷性事件的共同寫作，實際形成了一種集體性的記憶和網絡式的文本，即所謂“研宮擿微，懷柳囊辛。東謳共西缶並哀，白雲與紅桑競戚。都為一卷，係以弁言”。集體記憶的構建促成了情感共同體的形，這對於當時的飽經戰亂的文人而言，是極為重要的情感支柱，有助於戰亂中處於極端情境中的作者重新找回身分認同。

61 陳慶溥：《篋壑詞》（蘇州：蘇州圖書館藏，抄本），頁30b—31a。

雖然在此之前的詩詞唱和均體現出關鍵詞的彼此鈎連,以形成文本的聯結,但在淮海詞人的作品中,尤為值得注意的是特殊經驗(在這裏基本等同於創傷經驗)的共同寫作,如戰爭中的城市攻防、喪亂事件、節慶修禊……通過創作中橫向的彼此鈎連的時間提示、意象聯結,以及創作後的長時段的文本重訪,又使得個體和群體對戰亂的文化記憶不斷增強。

另一方面,關鍵詞的反复提示不僅有助於個體記憶的強化和集體記憶的增強,也有助於通過關鍵詞聯結和重複,來不斷重構和修飾作者的記憶。如丁至和、杜文瀾、蔣春霖等,由於有貫穿整個太平天國時期的詞籍存世,我們可以看到詞人如何通過創作在文學中重建失去的日常,看到了不同作者在書寫創傷時的個體差異,以及通過創作重構和超越過去痛苦的可能性。

(三) 作為過程的淮海詞壇

如果將淮海詞人的戰亂書寫作為一個整體的文學現象進行考察,應該承認這些作品共同對動亂時代如何兼顧詞體的敘事需求和審美形式的議題進行了有效嘗試,並產生了部分有示範意義的文本;即使其中的部分嘗試未被光宣詞人所認同,但仍有必要承認這類作品作為檢驗或試錯的詞史意義。正如張宏生先生所指出的,乾嘉時期提出的以詞紀史和比興寄託的詞學理論實踐:“只有到了太平天國戰爭前後,才提供了一個最恰當的實驗場和檢驗場”,“在此以前,不能說沒有出現過類似的現象,但不能不承認,只有到了這時,才更為集中,更為突出,成為詞史或詞學史發展中的一個重要標誌”。⁶²

莫立民在《近代詞史》中也提到了太平天國時期詞作的節點意義:

清代詞史進入晚近時期,鴉片戰爭開始的一系列外侮的刺激,太平天國以來此伏彼起的國內動亂和反抗,賁張、驚悸且喚醒著一大批有志之士的心魄。……於是,“禦侮”與“變革”就成為“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之晚清時代所奏響的最強音。晚清詞的生命力也隨著“天下興亡,匹夫有

62 張宏生:《詞史,興寄與時代——太平天國戰爭前後詞壇創作的理論自覺》,《中華文史論叢》2022年第3期,頁381。

責”的心潮得到一次新的張揚。詞就在這樣的心靈崎嶇之路上，完成了它又一次有價值的載運、傳達使命。⁶³

可以說，咸同詞壇的種種變革並非突然孤立出現的，而是詞史發展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過程。這一時期的淮海詞人群在戰亂敘事和個體經驗書寫上的突破，不僅是特定時代背景下的天機人事使然，也是一個詞史內部逐漸累積，最終由量變到質變的結果。而這一結果並非終點，正如學者所指出的，任何一個時代詞壇的發展並不孤立，隨著詞學文獻的不斷整理出版，我們可以發現鴉片戰爭、太平天國、甲午之役、庚子之變不僅是重要的歷史節點，也是詞學發展的重要坐標。⁶⁴

咸同之際的淮海詞人，以其獨特的生命體驗和寫作方式，擴充了詞史敘事、情感表達、創傷記憶的寫作經驗，揭示出詞體對於表述個人經歷和情感經驗的獨特功用，展現了宏大時局下普通個體的生命體驗和這一群體的集體記憶的建構，以及書寫苦難對個體生命的意義。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教授）

63 莫立民：《近代詞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頁379。

64 任軻：《咸同變局與詞壇新動向》，《文學遺產》2024年第2期，頁140—152。

引用書目

一、中文

(一) 專書

- 丁至和：《萍綠詞》。咸豐十一年曼陀羅花閣刻本。
- 丁至和：《萍綠詞再續》。光緒刻本。
- 王之春：《椒生隨筆》。揚州：廣陵書社，1983年。
- 杜文瀾：《采香詞》。咸豐曼陀羅花閣刻本。
- 李鴻章：《李鴻章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
- 李肇增：《淮海秋筮集》。咸豐十年遲雲山館刻本。
- 姚正鏞：《吾意齋長短句甲乙稿》。光緒刻本。
- 徐乃昌：《小檀樂室彙刻閩秀詞》。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8年。
- 譚獻：《復堂詞話》，唐圭璋：《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周曾錦：《卧廬詞話》，唐圭璋：《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謝章铤：《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唐圭璋：《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陳慶溥：《篋壑詞》。蘇州圖書館藏抄本。
- 莫立民：《近代詞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
- 梅爾清著，蕭琪、蔡松穎譯：《躁動的亡靈：太平天國戰爭的暴力、失序與死亡》。新北：衛城出版，2020年。
- 黃嫣梨：《蔣春霖評傳》。臺北：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
- 馮乾：《清詞序跋彙編》。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年。
- 湯氏：《鯁聞日記》等，莊建平：《近代史資料文庫》。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
- 楊夔：《秦鏡漢硯齋詩餘》。稿本。
- 趙烈文著，樊昕整理：《趙烈文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
- 曹樹基：《中國人口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
- 曾國藩著，殷紹基等整理：《曾國藩全集》。長沙：嶽麓書社，1990年。
- 蔣春霖著，劉勇剛箋注：《水雲樓詩詞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錢仲聯：《近代詩鈔》。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

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

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綱》。長沙：嶽麓書社，2013年。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高覺敷譯：《精神分析引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

（二）論文

王振忠：《杭州徽商子弟眼中的太平天國史事——新發現的徽州日記稿本〈記事珠〉題解》，《九州學林》第11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春季號），頁190—240。

王曉驪：《創傷性記憶的自我隔離和審美表達——唐宋詞戰爭災難敘事的特殊模式》，《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1期，頁109—115。

任軻：《咸同變局與詞壇新動向》，《文學遺產》2024年第2期，頁140—152。

朱惠國：《論鹿潭詞的感傷特質》，《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3期，頁65—69。

茆萌：《咸同詞壇淮海詞人群體研究》。蘇州：蘇州大學博士論文，2016年。

茆萌：《試論淮海詞人群體的創作風格》，《徐州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3期，頁55—61。

張宏生：《詞史，興寄與時代——太平天國戰爭前後詞壇創作的理論自覺》，《中華文史論叢》2022年第3期，頁349—381。

張宏生：《戰爭書寫與記憶疊加——清代的〈揚州慢〉創作》，《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頁61—69。

陳水雲：《咸豐、同治時期淮海詞人群體綜論》，《武漢大學學報》2007年第6期，頁824—830。

趙靜蓉：《創傷記憶的文學表徵》，《學術研究》2017年第1期，頁144—151。

二、外文

David Pillemer, *Momentous Events, Vivid Memori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Robert Goodin (ed.), Charles Tilly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ntextual Political Analys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The War Writings of the Huaihai Song Lyricists and Their Significance

Guo Wenyi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The Huaihai Lyricists were a literary group active in the Yangzhou region during the Xianfeng and Tongzhi reign eras. Most of these authors came from humble backgrounds, and there are no detailed records of them in the official history and local records. They were displaced from their homes and experienced the Taiping Rebellion. Their works reflect the turmoil and suffering experienced by literati in the Yangzhou area during this period. Previous studies of the Huaihai Lyricists have primarily focused on prominent writers within the group and their achievements in writing song lyrics with historic significance. This paper takes a micro-perspective, exploring the war narratives during the Taiping Rebellion and the subsequent post-war writings by this group of lyricists, presenting the individual experiences of bereavement, distress, and trauma during the war, as well as the long process of reconstructing daily life for transcendence after the war. Through their works, we can observe the enduring impact of the war on individuals and the authors' attempts to heal, but some of the literati ultimately could not heal themselves and descended into despair.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veal the unique function of lyric poetry in expressing personal emotional experiences through sorting out and analyzing these works, shedding light on the life experiences of ordinary individuals under the broad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memories of this group. It also explores the

significance of war-related works in the history of *ci* poetry.

Keywords: Taiping Rebellion; Huaihai Song Lyricists Group; War Narratives and Post-War Writing; Trauma Experience; Collective Memories